

宗教因素对伊斯兰帝国民族关系之影响

曹笑笑

摘 要: 民族问题已成为二战后政治秩序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宗教与民族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宗教不仅对民族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 还对民族间的交往产生了重要影响。中世纪早期的西班牙是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三个一神教的共存之地, 也是阿拉伯、柏柏尔、西哥特罗马和犹太各民族的大融合时期。以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的宗教因素为研究目标,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探索二者之间的关系, 为现代阿拉伯国家民族关系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 中世纪早期; 安达卢西亚; 民族关系; 宗教因素; 欧洲穆斯林

作者简介: 曹笑笑, 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阿拉伯语系 2008 级博士研究生 (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 1673-5161 (2011) 02-0076-06

中图分类号: D812

文献标识码: A

“宗教”与“民族”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 宗教对民族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民族、宗教这两类范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它们都是在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中发生关系, 历史上从来不存在抽象的民族宗教规律。”^[1]世界性宗教的产生使宗教开始突破单一民族的界限, 成为了某一地区多个民族的共同信仰, 宗教和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因此更为复杂和多样。中世纪的安达卢西亚是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共存之地, 也是早期阿拉伯、柏柏尔、犹太和斯拉夫等民族展开融合和交往的场所, 它为我们研究民族宗教规律提供了绝佳范例。本文以中世纪早期安达卢西亚境内的民族关系为例, 探讨宗教因素对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的具体影响及其表现。

一、宗教认同是民族认同的主位因素

宗教是人类的普遍经验, 宗教文化作为早期民族文化的主流或正宗, 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导了民族认同。

对中世纪早期的安达卢西亚伊斯兰帝国境内的各个民族而言, 宗教认同和宗教情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区分不同民族和人群的首要标准。不论是穆斯林、基督教徒还是犹太教徒, 在对民族属性的界定中都极力追求一种绝对的二分法。伊斯兰教创始人先知穆罕默德在著名的辞朝演讲中曾说: “人们啊! 你们的主是一个, 你们的祖先是一个, 你们全都来自阿丹, 阿丹来自土。在安拉看来, 你们中最尊贵的是最畏主守法者。阿拉伯人不比非阿拉伯人优越, 非阿拉伯人也不比阿拉伯人优越, 红种人不比白种人优越, 白种人不比红种人优越, 除非凭借敬畏。”这可谓是伊斯兰教对

早期朴素人本主义思想的最佳诠释，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它用于区分“我族”与“他族”的标准在于“是否敬畏‘真主’”。他们将非穆斯林——不论是基督教徒还是犹太教徒，有时甚至包括不同教派的穆斯林，称为“不信教者”或“多神教徒”。“伊斯兰教”成为了穆斯林区分本民族和他民族的普遍和充分标准。

除了在“自我”与“他我”认同中强调一元宗教标准外，穆斯林统治者在实际统治过程中，也采取了“宗教区别和等级政策”。特别是在民族关系发展的初期，为防止和远离“异教徒”对伊斯兰教的污染和影响，规定契约民禁止在公共场所公开宣传他们的宗教；禁止基督教教堂鸣钟；允许他们使用已经存在的基督教堂和犹太教堂，但不允许扩建和新建；甚至要求非穆斯林人穿有标志的服饰并佩戴特殊腰带等歧视性政策。他们将宗教作为区分社会阶级的标准，人为地设置和强化不同民族之间的界限。契约民作为帝国内的二等公民，在经济上需缴纳人头税；在法律地位上，被规定禁止持有武器、禁止在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法律案件中作为证人指证穆斯林，不允许与女性穆斯林通婚等。

基督教亦是如此。“基督教徒用‘摩尔人’^①来称呼安达卢西亚的穆斯林——不论他是阿拉伯人、柏柏尔人还是新穆斯林，也不论他们是白人还是黑人，而用克里斯蒂亚诺人（Cristiano）来统称西班牙北部操罗曼语的民族。”^{[6]5}

伊斯兰统治者将“宗教”作为普遍和唯一区分标准的做法，实际上淡化了地域、文化、人种、语言等因素对民族认同的影响。当时帝国境内有这样一群基督教徒，他们在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上已经被完全阿拉伯化了，能将他们与其他穆斯林相区别的唯一特征就是宗教。基督教徒们称他们为“莫赞勒布”（意为“阿拉伯化的人”）。伊斯多^②将他们描绘成“一群极具基督热情的生活在异族统治下之下的战斗士”，甚至将他们与基督教的“光复运动”联系起来，打造出了一群早期西班牙民族主义者的形象。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各个民族唯宗教标准思维下非此即彼的单一民族认同模式。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尽管统治者极力宣扬和夸大宗教认同的重要性，依然无法忽视语言、文化或血缘等因素对民族认同和民族关系造成的影响。也就是说宗教统一没能消除穆斯林群体内部各个族群（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和斯拉夫人等）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这种矛盾摇身一变，又以宗教矛盾的形式呈现在了世人面前。

二、宗教矛盾成为民族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

宗教矛盾作为民族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不仅体现在不同宗教的民族之间，也体现在了同一宗教的不同教派之间。

这一时期穆斯林西班牙境内的民族矛盾往往是以宗教的名义发起的。850~859年的科尔多瓦殉教运动，是一场以反对伊斯兰教统治为目的而发起的基督教徒殉教运动。一批基督教徒激进分子通过在公开场合辱骂和诽谤伊斯兰教及其先知的方式，来激起穆斯林当局对他们的迫害和镇压。这一事件发生在公元9世纪下半期的科尔多瓦，当时的安达卢西亚在倭玛亚王朝统治下正处于各个民族和宗教的融合时期，文化渗透、改宗和混合婚姻是9世纪科尔多瓦的三大社会现象。杰西

①“摩尔人”一词是中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对北非穆斯林的贬称，他们包括了来自北非的柏柏尔人、阿拉伯人、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林和部分西非人——他们在阿尔摩拉维德王朝(Almoravid Dynasty)时期被纳入该王朝。

② 伊斯多（560~636年），曾担任塞维利亚主教达30年之久，是西哥特王国时期著作最多也是影响最大的教会作家。

卡·库柏（Jessica A. Coope）是这样诠释这场殉教运动的起因的：“由于伊斯兰文化因素的存在，政府变得越来越强大，官僚体制开始健全，宫廷中的文化生活开始占据重要位置。基督教徒日益被纳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氛围中。在这样的伊斯兰环境中，这些自发的殉教运动是很容易被理解的：他们代表了一种向伊斯兰教转化进行抵制的心态，希望通过古罗马的殉教式英雄主义行为来唤醒科尔多瓦基督徒们对基督教的归属感。”^{[7]63} 因此，在这场以宗教名义发起的殉教运动中，论证基督徒们受到了来自伊斯兰社会的宗教迫害成为了当务之急。欧洛吉亚^①描写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穆斯林非常傲慢地对待我们。教堂的钟声往往引起他们的嘲笑……他们即使没有迫害我们，那也是上帝的仁慈带给我们的。”^[9]阿尔维律说：“即使这不是一个迫害的时代，也是一个背叛的时代、充满死亡的时代。”^[9]

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殉教者所极力推崇的殉教行为并没有在广大的基督教徒中引起支持和共鸣。公元 852 年，塞维利亚主教瑞卡弗瑞德（Reccafredus）在托莱多召开的宗教会议上公开谴责了这场运动，认为这些狂热的“赴死者”相对于罗马时期为坚持信仰而忍受拷打、啃噬、炮烙等酷刑的基督教徒而言，根本不配得到“殉教士”的称号。他们极力与“殉教者”们划清界限，为的是获得穆斯林统治者的谅解和维护他们在穆斯林社会的既得利益。

由此可见，这场殉教运动只是借“宗教”名义而发起的反抗运动，殉教者们企图通过这种行为来唤起基督徒们对自身文化和民族的认同和归属感。“他们已经忘记了他们自己的语言。”“试问：在俗世人中，我们还能找出那些受过教育的，能读拉丁经典的具有神圣《圣经》知识的人来吗？……基督徒不知他们自己的法律，不会使用拉丁文，在基督学院里，都无法在一千个人中找出一个能用流利的拉丁语给他兄弟写信的人。”“在我们今天的世俗人之中，有哪个受过教育的人表现出对《圣经》、对教会拉丁文作品的关注呢？那些年轻的基督徒们，拥有俊美的外表，伶俐的口齿，服饰鲜亮、举止得体，会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热情的讨论，热心的收集，用他们的语言赞美阿拉伯文化；而另一边是忽视我们教会的美好，忽视教会这个天堂里流淌出的信仰之河。模仿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8]68} 很显然，在民族交往和融合的过程中，对自身文化特征丧失的焦虑和民族命运的担忧，才是引发这群殉教者行为的真正动机。

将持有不同信仰的人视为异教徒，这样的思维习惯一旦形成，就会很自然地将原本信奉同一宗教但是具有不同观点的人或派系也成为异教徒^{[11]107}。当一个民族接触到一种新的宗教文化时，民族的主体性就会有所表现，产生强烈的选择性。在实际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一个民族会根据自身原有的文化水平和价值观念对新宗教的教义和思想进行自己的解读、阐释和发挥。因此，当伊斯兰教走出半岛，脱离阿拉伯民族起，教派的差异便开始与民族文化的差异息息相关，并因信徒原有民族文化的差异而固化。东部伊斯兰帝国经历了逊尼派和什叶派等教派之间的严重分歧和斗争，在安达卢西亚境内，虽然这种教派分歧由于统治者的政策和地理环境等客观原因相对缓和，却依然存在。

自 7 世纪阿拉伯人征服北非开始，柏柏尔人就开始了伊斯兰化的进程。在 711 年的军事行动中，柏柏尔人成为了征服运动的主力军。但随后他们却没有享受到胜利者应有的待遇，大多数柏柏尔人被排挤在统治阶层之外，并局限在农村、北部和边远山区，他们在文化和语言上的阿拉伯化程度甚至不及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到 10 世纪时，安达卢西亚境内还存在着两个纯粹只说柏柏尔

① 基督教殉教运动的见证者和辩护者，也是殉教者之一，出生于科尔多瓦的贵族家庭，身上具有阿拉伯血统。其著作《殉教圣人行传》（*Documentum Martyriale*）和《殉教辩护论》（*Apologeticus Martyrum*）是了解这一时期殉教运动的主要著作。

语的地区——特鲁埃尔^①和埃尔巴拉斯。在巴尔格瓦塔部族中，一直到伊历2世纪（公元8世纪）时期，他们仍然信奉的是巴卡神，而不是伊斯兰教。

哈瓦利吉派——有人认为它是“舒欧比亚主义”的前身——在北非和安达卢西亚的柏柏尔穆斯林中普遍流行。这一派别在政治上主张民主选举思想，认为哈里发的资格不应当限于古莱氏人，而应属于全体穆斯林，不论是阿拉伯人还是非阿拉伯人，不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在宗教信仰上主张单纯的绝对信仰，并不惜以战争保护。这种思想恰恰符合了柏柏尔人在政治上寻求平等，反对大阿拉伯主义和游牧民族的信仰特征，因此很快被他们所接受，并时常以行动落实。在征服运动胜利后的初期，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之间持续而频繁的内战成为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在阿拉伯人的眼中，柏柏尔人经常被形容为异端邪说的制造者和传播者，甚至连伊本·赫尔敦也形容他们为“持续的叛教者”。

从10世纪下半期开始，由于北非政局的变化和倭玛亚统治者重用雇佣军的政策，柏柏尔人在安达卢西亚的人数和地位持续上升。伊本·哈彦^②的记载反映了柏柏尔人在哈克木二世（961~976年在位）期间的情况：“阿卜杜·拉赫曼三世（912~961年在位）憎恨柏柏尔人，哈克木初期也是如此，他甚至禁止他的随从、雇佣军和常规军模仿柏柏尔人的衣着方式和马具。但后来哈里发开始逐渐喜欢柏柏尔骑兵了，并将它们大量的招募入军。这使他逐渐偏离了前任者，正是这种态度的转变，使哈里发的帝国陷入了危机。”^③“侍从长”曼苏尔于1002年死后，倭玛亚王朝进入衰弱和分裂时期，柏柏尔人和斯拉夫人等外籍军事贵族势力介入了哈里发宫廷势力的角逐并最终葬送了哈里发王朝。

在随后诸小王国时期，教派纷争由于政治上的分裂而加剧。从11世纪开始，北非与西班牙穆斯林在对伊斯兰教义的解释上发生了严重的混乱。除了过去一直流行与安达卢西亚地区的正统派（主要是马立克派）的“认一论”教义——即信仰真主是唯一的、无始无终的，还出现了“人、神同性论”的解释。可以说，各民族和统治阶层之间的矛盾直接反应在了宗教领域。帝国的全面伊斯兰化和统治阶级对伊斯兰教的推崇和膜拜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宗教成为统治者证明自身合法地位的最重要手段。不论哪个民族的统治者，一旦将自己塑造成伊斯兰教保护者的形象，便能在政治上掌握主动权。阿卜杜勒·瓦希德·马拉克什在《马格里布奇闻录》一书中写道：“教法学家在穆拉比特人统治时代^④极有权势，埃米尔们无论做什么决定，不管大事，还是小事，都要有四位教法学家在场，其作用之大远远超过了征服安达卢西亚的初期。”^{[2]46}

三、宗教文化是促进民族认同和民族关系的文化基石

在人类的发展过程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民族间的差异即表现为文化间的差异。一种文化体系以民族为载体，而民族也是以文化为聚合。宗教对民族认同的构建和强化并非凭空想象和虚无缥缈的，这种渗透是建立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民族文化为宗教向民族心理渗透奠定了文化基石。

① 特鲁埃尔和埃尔巴拉斯都是位于西班牙东北部的两个小镇。

② 伊本·哈彦（987~1076年），安达卢西亚历史学家的泰斗。他不仅是一位大历史学家还是一位文学家，曾担任过曼苏尔·本·阿米尔的书记官。伊本·哈彦的著作均已散失，只有《安达卢西亚历史之光》和《历史鉴赏》的部分章节传世，被拜萨姆等后来的历史学家引用。历史学家和传记学家对伊本·哈彦的评述是：传述真实、文笔优美、表达洗练。他的著作若能全部保存下来，安达卢西亚历史上的很多疑点都可以得到澄清。

③ 资料来源于Tomas F.Glick的“Islamic and Christian Spain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中世纪早期的西班牙伊斯兰与基督教），详见第五章第三节中关于安达卢西亚境内多民族竞争的观点。

④ 西班牙的穆拉比特王朝是阿拉伯人进入西班牙后，北非柏柏尔人在西方建立的第一个独立的王朝。

希提指出：“这个时代（指阿卜杜·拉赫曼三世和哈克木二世时期——笔者注）真正的光荣，不是在政治方面，而是在别的方面。”^{[4]631} 这里所谓别的方面就是指文化和学术上的繁荣。

阿卜杜·拉赫曼三世统治期间，科尔多瓦大清真寺内创办了科尔多瓦大学，“这所大学比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和巴格达的尼采米亚大学还优越，它吸引了许多基督教学生和伊斯兰学生，他们不仅来自西班牙各地，而且来自欧、非、亚三大洲。”^{[4]631} 哈克木二世对学问的喜爱，更超过了他的父亲。他本身就是一位有名的学者和历史学家。“他学问之渊博，在西班牙诸哈里发中是罕见的。他和阿拔斯王朝第七代哈里发麦蒙，是东、西哈里发王朝中的两大明星……哈克木享受父亲的余荫，过着承平的生活，得以大部分精力搜集书籍，科尔多瓦图书馆极为宏大，仅目录一项，就有44册之多。全部书籍60余万册，大半由他派人到埃及、叙利亚、巴格达、波斯搜集而来，收集图书的风气，遍及民间，人民抄录古书，风行一时。”^{[3]208} 他还重金聘请了东方的许多学者来科尔多瓦的大学任教和讲学，在这些教授中就有著名的史学家伊本·古提叶、语言学家爱卜·阿里·嘎里等。“最值得一提的是，哈克木二世最注重各地清真寺教长的人选，不用顽固的宗教家，而是开明的学者，让他们借民众来礼拜的机会，讲述各种学问。”^{[3]208}

到了曼苏尔时期，尽管在政治上实行专政，但“他提倡学术文化……常亲身巡视各清真寺、各学校，并入座听讲，参加讨论；亲近学者教师，奖励寒苦学生。他执政期间，全国清真寺的教长，多是有学问的学者，全国清真寺都成了各地研究学问的中心，清真寺讲授哲学、天文、数学等课程。教师以宣教的方式来传插学问，企图使宗教和学术融汇贯通，即解脱了宗教的束缚，又防止宗教人士对学者的迫害，宗教与哲学的矛盾得到缓解”。^{[3]208}

托马斯·克里克将安达卢西亚特色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形成过程称之为“文化结晶”。随着穆斯林人数在半岛内的急剧增加，该文化逐渐超越了单一民族文化的范畴，成为所有信奉伊斯兰教民族的共同文化。例如到10世纪时期，半岛居民在语言上的阿拉伯化基本完成，阿拉伯语几乎成为了各个民族人民共同的生活语言。新穆斯林们热衷于学习和改进他们的阿拉伯语，并丝毫不为地区方言的口音感到羞愧。在文学创作上，他们偏爱使用西班牙阿拉伯语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标准阿拉伯语。人们将阿拉伯语的使用看作自然而然的事，与一个人的宗教和民族属性并无关联。同时，阿拉伯语自身也发生了变化。西班牙特色阿拉伯语开始形成，它融合了古典阿拉伯语和西班牙罗曼语的特色。如在发音体系上，“p”（阿语通常用“ف”和“ب”表示）在安达卢西亚方言中占据了整个音位；元音长度代替了语音的重读；在语法上，用虚词“ل”来表示原先的宾格（相当于罗曼语中的“a”）；在词汇顺序和句法结构上更为灵活和自由。但在形态学上，由于罗曼语和闪语的巨大差别，字母的书写仍延续了古典阿拉伯语的体系。

安达卢西亚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自身得到繁荣的同时，也对其他宗教和民族的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伊斯兰统治者的文化繁荣政策下，从10世纪开始，西班牙逐渐超过了东方的巴格达，成为当时犹太文化的发展中心，10~12世纪的安达卢西亚被犹太人誉为犹太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不论是在语言、文学方面，还是在自然科学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基督教文化亦是如此，当欧洲广大的基督教徒仍在苦渡长达数个世纪的“黑暗时代”时，安达卢西亚的基督教文化却独放异彩。在托莱多的图书馆中就收藏着许多基督教人著作的手抄本，其关于音乐一类的见解，多取自穆斯林的著作。不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学术、宗教，无不受到来自伊斯兰教的影响。与这一时期多元文化共同繁荣局面相对应的是各个民族之间的融合和交往进入飞速发展时期。

四、结语

伊斯兰教作为阿拉伯各民族文化的核心要素，对阿拉伯各国民族关系的影响可谓意义重大，不论是在久远的中世纪时期，还是在民族进程已经取得重大发展的当今社会。作为一神教，伊斯

兰教“一元别异”的思维模式和单一的民族观使其具有强烈的输出性和排他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条件下,伊斯兰教对促进各民族的交往和融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同时也应看到,单纯的强调宗教统一和团结并不能消除各民族原有的分歧和矛盾。民族交往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各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民族关系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各民族发展的权利和利益。因此,只有在民族交往的过程中实现各民族自身发展的利益最大化,才能真正促进民族关系朝有利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 [1] 张践. 民族宗教关系的社会理论考察[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9.
- [2] 艾哈迈德·爱敏.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七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 [3] 纳忠. 阿拉伯通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 [4] 希提. 阿拉伯通史[M]. 马坚,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5] 郑晓云. 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 [6] Thomas F.Glick. Islamic and Christian Spain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M].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5.
- [7] Goard Larsson. Ibn Garcia's Shu'ubiyya Letter: Ethnic and the Theological Tension in Medieval al-Andalus[M]. Boston: Brill Academic Press, 2003.
- [8] Maria Rosa Menocal. the Ornament of the World-How Muslims, Jews and Christians Created a Culture of Tolerance in Medieval Spain: Interaction and Culture Change[M]. Pentimento: Back Bay Books, 2001.
- [9] Kenneth Baxter Wolf. Christian Martyrs in Muslim Spain[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The Impact of Religion on the Inter-ethnic Relations in the Early Medieval Spain

CAO Xiaoxiao

Abstract The famou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s and sociologists Feliks Gross once indicated that “Ethnic issue has become a major concern in the post- World War II’s political order.”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and ethnicity. Religion does not only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thnic groups, but also has great impact on the inter-ethnic relations. The early medieval Spain is a place where three monotheistic religions Islam, Christianity and Judaism coexist and a period of great fusion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cluding Arabs, Berbers, Visigoth-Roman Christian people and Jewishes. A study on the religion’s impact on the inter-ethnic relations in early medieval Spain helps us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d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groups in our nation today.

Key Words Early Middle Ages; Andalusia; Ethnic Relations; Religious Factors; European Muslims

(责任编辑: 李 意)

本刊责任编辑

李 意